

谈《说文解字义证》许瀚 校样本的学术价值

崔国光

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部貌似普通，实则极具学术和版本价值的奇书。表面上看，此书是一部清道光二十八年灵石杨氏刻印的连筠簃丛书本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和其他的杨刻《义证》并无多少不同，但仔细检阅便会发现，它并非正式刷印的《说文解字义证》。全书系散页毛装，书中有许多墨笔批语，字体清秀刚劲，一看便知是大家手笔。书的每一卷首页的右下角，都钤有“印林手校”的朱色印记，第48卷末页更有手书“咸丰二年六月廿三日刻样二校”字样。众所周知，《说文解字义证》是由许瀚（印林）校勘后刻成的，这部“刻样二校”显然是刊刻过程中许瀚批阅的清样。杨刻《说文义证》刷印的很少，大约只印了几十部，版片即毁于兵燹，因此当时即较为难得。至于许瀚手校的清样，历经数百年而能传至今天，那就更是稀世珍籍了。

该书的首页，钤有朱文篆字“孝陆”及白文“模皕阁考藏图籍书画印”印章，证明此书原为安丘赵孝陆先生所藏。孝陆先生精于鉴赏，收藏丰富，尤其留心乡邦文献，所收许印林、王篆友等名家稿本、批校本颇多，其弟赵孝孟曾据以编写许印林年谱及攀古小庐遗文。孝陆去世后，家人将其所藏善本古籍，售于山东省立图书馆，此《义证》清样即其中之一。初始，因为此书装订

粗糙，书页陈旧，并未引起重视，被置于普通古籍书库之中，尘封多年。1987年检阅此书时，才发现这是一部和一般连筠簃丛书本《说文解字义证》不同的本子，它不仅保留着原刻《义证》所缺少的第40卷第43页的内容，而且保留着许瀚宝贵的重要批语，其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绝非一般连筠簃丛书可比。

一、桂馥和《说文解字义证》

研究文字学，现在大家无不推崇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把它视为文字学的开山之作。其实，《说文》这部书，清代以前的人并不十分作兴。宋元间徐铉、徐锴、李焘等人虽间有撰述，然发明甚少。明末有些文人喜用僻字，遂把《说文》当作枕中鸿秘，但并不了解它的价值和作用。真正对《说文》进行认真的研究，还是清代，特别是乾嘉以后。惠栋的《读说文记》开清代《说文》专书之首，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，研究著述风起云涌。最著名者，有所谓《说文》四大家。即：

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

桂馥的《说文解字义证》

王筠的《说文释例》、《说文句读》

朱骏声的《说文通训定声》

四家之中，前两家尤为世人所重。一是著述较早，庶事草创，有筌路蓝缕之功。二是两人各有专擅，风格迥异，其研究成果恰可互补。《清史稿·儒林传》中，有一段谈及两人之不同成就，颇为精彩：

馥与段玉裁生同时，同治说文，学者以段桂并称，而两人两不相见，书亦未见，亦异事也。盖段氏之书，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；桂氏之书，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。段氏钩索比附，自以为能冥和许君之旨，勇于自信，自成一家之言，故破字创义为多；桂氏专佐许说，发挥旁通，令学者引申贯注，

自得其义之所归。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，桂书繁而寻省易了。

夫语其得于心，则段胜矣；语其便于人，则段或未之先也。

从独创性看，桂馥显然不及段玉裁。段书勇于自信，见解精辟，卓然成一家之言；桂书则恪守许氏藩篱，不敢擅越雷池，只是引他书以作旁证，且皆案而不断。然而，从积累之深厚、检阅之方便看，桂书又远远超过段书。《义证》于每字之下罗列各种古书的解说，令学者触类旁通，绌索自得，看似繁杂，实则简便适用。

桂馥字冬卉，号未谷，山东曲阜人。一生博览群书，潜心小学，尤精训诂。他曾说：“士不通经，不足致用；而训诂不明，不足以通经。”他把文字训诂视为通经致用的基础。他50多岁才中进士，只做了一任学官（长山训导），一任知县（云南永平县），仕途堪称穷迫。但他用40多年的时间，“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”，“力穷根柢”，写出了五十卷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对《说文》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桂馥用毕生的精力写出了《义证》，但却留下了两个遗憾。其一是书未刊刻，留下的仅是一部原稿。其二是原稿并非完成的定稿，在第三十七卷“台”字下引《高唐赋》，有“查高唐赋原文”六字，足见书稿尚未完成。要把这样一部稿子刊刻成书，尚需做大量的查证、校勘工作。最终完成这一工作并把该书付印，从而弥补了上述缺憾的，则是清代另一位山东籍的学者——许瀚。

二、许瀚三校《说文解字义证》

许瀚字印林，山东日照人。和桂馥比较，他在仕途上就更蹇涩了，道光十五年中举，然后是“五上春官不利”，始终未能考中进士。生平只做了一任学官（峄县教谕），而且很快便丁忧去官。但许瀚的学问，却是世所公认的。他博综经史，精于训诂，而且通金石文字。其校勘古籍，“精审不减黄丕烈、顾广圻”。龚自珍

推崇他为“北方学者第一”。遗憾的是，许瀚并未留下多少著作。他曾先后三次通校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时间绵延几近三十年。他默默无闻地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《义证》的刊刻，使桂馥这部煌煌巨著终于面世，其为学术而牺牲个人的精神，委实令人钦敬。

许瀚第一次校勘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是应李璋煜之邀进行的，时间在道光六、七年间（1826～1827）。许瀚是通校全书者，同时参校的还有王筠、袁练、许梱、陈宗彝等人，所用底本是个抄本，该抄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，上面钤有“东武李方赤收藏”印，还有参校诸人的校语以及许瀚所写的跋。此次校后并未付梓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杨刻《说文义证》，前言称是李璋煜校本，恐系误解。

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杨以增拟刻印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再次邀请许瀚校正，是为许瀚第二次校勘。这一次所用底本是桂馥原抄本。此抄本原藏桂馥之孙桂显枕处，显枕老病无子，恐抄本失传，遂送交曲阜孔宪彝代为收藏。是年冬，杨以增托汪喜孙将此抄本带至济宁，交付许瀚校正。用原抄本校刻，避免了传抄中的错误，当然比用一般抄本好得多。可惜不久杨以增调任陕西布政使，《义证》在济宁仅仅刻了一册，即告中止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在王筠、张穆等人的怂恿下，书商杨尚文（墨林）决意出资刊刻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，于是许瀚第三次承担起校勘的任务。当时许瀚正抱病编纂《史籍考》，难以兼顾，遂邀薛寿、田普实专司校勘。薛、田诸人一面校，一面就在清江浦刻印，七个月校了将近全书的一半，刻了两卷多。许瀚病体稍愈，即赴清江浦查看，“核其所校，则黑白颠倒，任意删改，任意呵斥，直以桂君为小学生而已为老先生。因思就此刻成，桂书毁矣，翻不如无刻之为愈也。不得已，辞谢二公，暂且停办。”（《许印林与王篆友书》）《义证》的刊刻再次陷于停顿。

停刻不久，许瀚抱病承担起全部校勘任务。由于薛、田诸人的妄改，校勘更加费力。许瀚在给王筠的信中说：“先经江南诸名士校订，丑谬百出，不可言状。弟校桂书，复校校桂书者之谬，既劳且愤，殊难为情。”至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校勘总算粗就。次年，设局于江苏赣榆青口镇，启工刊刻。时许瀚因父病家居，住在日照，距青口镇约百余里，刊刻中，他“奔波数次，写样刻样，纷纭校勘，昼夜靡暇。”（《许印林复商丘李雅玉昆仲书》）直到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《义证》始告刻成，并且刷印了几十部。

许印林在咸丰二年六月所看的“刻印二校”，正是他往返日照和青口镇之间“纷纭校勘”的最后一遍清样。杨刻《义证》的扉页上，有“道光卅年二月启工，咸丰二年五月讫工”字样，则此“刻样二校”，乃是在刻完之后又看的样。但许瀚在此样上批改的内容，大部分都剝改过了，证明看这遍清样仍是在刷印之前。由此可知，《义证》虽然在咸丰二年五月刻竣，但六月二十二日尚未付印，真正付印的时间当在咸丰二年的七、八月间。

三、学者风范

因为是最最后一遍清样，所以“刻样二校”中校改的地方并不多。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校语，却充分显示了许瀚在校刻《义证》时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纠正桂书讹误的深厚功力。

如前所述，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只是一部未完成的底稿，许多引书需要查对。为此，许瀚做了大量的查核，直到“刻样二校”，他仍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。如：卷五 54 页 8 行，原稿论衡之后有一墨丁，许瀚批道：“此墨丁勿去。《御览》卅六引《论衡》曰：‘地之最下者有杨兖二州，洪水之时此二土最被水害。’检今《论衡》无之，只好加‘御览引’三字于上。”在刻本《义证》中，此处变成了“《论衡》御览引”显然，桂馥在引用《论衡》这段话时，并未查对原书，故留一墨丁。许瀚查后发现，此段引文，

今本《论衡》中无，而为《太平御览》所引，于是加上“御览引”三字。但因书已刻完，墨丁又在论衡之后，所以本应为“御览引论衡”，变成了“论衡御览引”。

尽管许瀚做了大量查证，《义证》仍留有一些问题。正如许瀚给朋友的信中所说：“义证刻成，不安于中处尚多。”“刻样二校”也反映了这一情况。如卷三十二中，9页10行“为恕”之前，10页7行“为慈”之前皆有一墨丁。许瀚批道：“此（为恕）及‘慈’字底稿皆未谷先生手抄，姑依刻，俟查子华子善本。”刻本墨丁依旧，刻后数年许瀚又校了一次《义证》，称为《说文义证定本》，此二墨丁始补齐，原本是“如心为恕”“兹心为慈”，想是许瀚终于查了子华子的善本。

许瀚校勘《义证》，最有价值的工作是纠正桂馥的讹误，这从“刻样二校”中也可看出。如卷一第8页4行，原稿：辛言示辰童音章，皆从古文上。许瀚校：“汲古初印及小字本皆无‘言’字，剡本依小徐本误补，此稿有‘言’无‘龙’更误，今仍从初印本可也。”按许瀚的意思，汲古初印本《说文》正确，此段应作：“辛示辰龙童音章，皆从古文上。”桂稿依小徐本误补“言”字，又漏去“龙”字，不确。可惜刻本《义证》未能遵从许瀚的意见改正，可能是因为书已刻毕，不便剡改的缘故吧。又如卷二十第10页“北魏高湛墓志铭”，许瀚校曰：“高湛墓志，《金石萃编》列于东魏元象二年。”卷三十一第25页3行：“《汉书·韩信传》作暮”，许瀚校曰：“崩通误韩信，‘昨’误‘作’”。

在“刻样二校”中，有一些订正讹误的批语是许瀚的弟子丁艮善写的，有的也颇有价值。如卷五第36页6行，原稿：“《孟子》：‘嗔然鼓之’，正作嗔。”丁校：“《孟子》不作嗔，此桂误也。宜改作‘填’，去‘正’字。”同页第8行，原稿：“嚶嚶无节度也，非本书义。”丁校：“嚶疾故无节度。‘非本书义’句宜删。”等等。

在订正桂书讹误时，许瀚是非常慎重的，有些错误虽然看得

很清楚，也不妄下雌黄。如在卷十四副页上，有下列案语：“谨案：第二页，‘𠄎，告也。从册曰，侧麦反。’此全用小徐本也。大徐本作：‘𠄎，告也，从曰从册，册亦声，楚草切。’桂书大例，说解用大徐本，小徐本有异同则见于义证。此独用小徐，反切亦用朱翱，未知桂意云何。不敢擅改，许瀚谨识。”此段明显违背桂书体例的错误，终于未改，这显示了许瀚对前辈学者的尊重，和薛寿、田普实等人的“任意删改，任意呵斥”，适成鲜明的对照。

“刻印二校”的批语，还充分显示了许瀚对校刻工作的一丝不苟。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，试举数例如下：

卷三第 21 页，𠄎 校语：𠄎从刀。

第 9 页，𠄎 校语：剔断草头，此最易事，乃不就中央剔开，而靠一边作 𠄎 形，又成一错字矣，可恨，可恨！

卷四第 32 页，校语：此页行间多不净，务须细细寻剔。

卷七 舌儿 校语：舌上不从 𠄎

卷十三第 20 页，校语：算从 𠄎，不从 𠄎。

卷二十二第 1 页，校语：𠄎好！𠄎取直势！

卷二十五第 7 页，周礼，形方氏，校：𠄎

卷二十九第 2 页，原稿：石，山石也，在厂之下，○象形。校语：宜扁而方，不可太圆。

第 42 页，老……从人毛 匕，言须发变白也。校语：匕与 匕 不同。

卷三十八第 53 页，校语：补字太不匀，用人许多钱财而如此草草，于心何安！

此外，批语中关于篆字描画不准，笔画残断，版框不足，鱼尾补齐等等，屡见不鲜。可以说，大到字的部首、笔画、小到线框、鱼尾，许瀚无不一一批改，务求准确。充分展现了一代学人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崇高风范。